

# 稳定与嬗变：环境变迁下的政党适应性研究

陈 炜，周朋飞

(福建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政党适应性是指政党在发展过程中应对环境所形成的调整适应能力，是在与环境的互动中后天获得的特性。这种特性包括两个层面：其一是“刺激—回应”模式，即政党被动根据环境变化，改变和创设新的政治体系以使组织存续；其二是“预测—控制”模式，政党可根据自身需求，主动培育新的政治话题，控制环境演进方向以适应组织的发展。政党适应性在不同阶段表现为不同的特质，是一种动态的适应性，政党适应性因政党起源、环境、文化的不同而差异明显。政治现代化对政党适应性提出了新的要求，政党必须主动回应挑战，但同时政党适应性也是推动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关键词：**政党；适应性；现代化；控制

**中图分类号：**D 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92(2017)06-0006-06

政党是政治现代化的产物，政党政治是当代民主政治的主要特征，同时政党自身也沿着现代化的轨迹演进。从政党发展角度来看，政党发展就是一个逐步战胜环境挑战的过程，政党必须在环境的流动性与制度的稳定性间求得平衡，而具有强适应性和自主性的组织更易存续和发展。尽管各国社会环境迥异，历史发展阶段不同，但提高自身调适能力都是政党现代化普遍的应有之意，现代治理环境的易变性对政党适应性则提出更高的要求。政党适应性不仅指提高应对环境挑战的能力，还包括监测环境动态以引导组织向特定方向发展的能力，以自身变革适应社会潮流，引领社会治理方式的现代化转型。政党适应性是政党组织嬗变和现代化发展的重要保障，继而影响多元政治主体和体系的现代化进程。总的来说，环境输入是根本性的，政党自身是可控变量，输出不同的适应模式，与环境交互作用，改变自身的同时，也延缓或加速了环境变迁。

## 一、概念内涵与理论特征

国外对政党适应性的考察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逐步展开的，对适应性的概念界定有多向的维

度，各有侧重，大体可分为制度主义和社会学两大方法论体系。亨廷顿在《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提出政党适应性是政党制度化水平的首要指标，将适应性定义为一种克服环境变化和挑战的能力，是一种组织在与环境的动态互动中后天获得的能力，主要表现为政策变革和政治整合能力。而适应性又可以用组织寿命来进行测量，包括三个具体指标：自然寿命、世代性寿命和职能适应性。据此，亨廷顿认为一个组织存在时间愈长表明其适应性愈强，其继续存在的可能性也愈大<sup>[1]14-17</sup>。布鲁斯·迪克森以执政党为分析单位，将政党适应性定义为一种“政治体系的创设”，是基于对社会多元主体不同利益和需求的反应，而进行更新和改造现有政治体系以容纳新兴政治力量的一系列行为。迪克森将适应性分为两类：效能型适应(Efficient Adaptation)和反应型适应(Responsive Adaptation)，前者体现政党的被动适应，后者强调政党对环境的监测与主动调适。而政党的适应性又取决于党内精英间的互动，政党对环境的监测与反馈能力以及外部环境本身的性质。政党适应性是一个多元博弈的过程，不可避免地带有风险，政党必须决定满足社会不同利益

收稿日期：2017-07-24

作者简介：陈 炜(1992-)，男，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西方政治思想史；周朋飞(1992-)，男，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党史与党建。E-mail:458541800@qq.com

的优先顺序，避免多元主体的冲突所导致的混乱<sup>[2]45-47</sup>。美国著名政治社会学家帕诺比昂科从制度主义的角度，将政党适应性看作外部输入变量与政党既有结构间互动导致的变动，强调外部环境、政党起源模式和制度因素对政党适应性的影响。帕诺比昂科是通过对现实中的部分政党（英、法、德、意）的经验考察得出其结论的，因此帕诺比昂科声称这种尝试性的解释只局限于西欧政党。帕诺比昂科强调外部环境中的制度因素，如选举制度、政治文化、社会经济发展、法律制度等对政党适应性发展的影响。但同时帕诺比昂科更为重视历史对当下及未来的影响，“即认为政党有限制其随后发展的‘决定性时刻’”，“政党建立之时就已确立的特定的党内关系模式”<sup>[3]87-88</sup>限制了政党组织变革的可能选择，同时根据变革的不同程度又可将适应性变革分为“持续性变化”与“根本性变化”<sup>[4]3</sup>。卡兹和梅尔在其发表的论文中提出欧洲政党演进的四阶段范式，政党发展大致经历了干部党——群众党——全方位政党——卡特尔政党，勾勒出政党结构面对环境做出的适应性调整框架。政党结构是按“刺激—适应”模式，根据外界环境变化不断调适的适应性结果，现实中并不存在完全的卡特尔政党，政党现实结构是适应变革中的复合结果。梅尔并不是把政党作为单一行动角色进行考察，而是采用“分层制”区分了政党的三种角色，即：公共机构中的政党、党的中央组织、党的地方或基层组织。相应地政党的适应性也涉及治理角色、政策主张、选民构成三个不同的层面<sup>[5]408-415</sup>。梅尔将适应性看作“适应”与“控制”的过程，“适应和控制并非仅仅是政党的能力问题，它们同样源于政党体制本身的结构与安排，以及政党之间相互作用下既定模式的稳定性”<sup>[6]119</sup>，政党适应性来自外部环境的变量输入，政党变动的根本在于其所处的环境，无论是被动适应还是主动控制，其变化参数都可以在政党所处环境中发现。不同于梅尔通过外部环境来解释政党适应性变革，哈默尔和简达采用内源性模型来解释政党适应性。内源性模式的前提在于组织结构惰性越大其结构稳定性越强，组织适应变革来自于内部变化。其模式可以简化在外界刺激下，具有主观动机的行为主体在内部自

变量影响下输出不同的适应性结果。影响适应性变革的自变量包括政党领袖变更、党内掌权派别的变化以及党龄。其中政党领袖的作用尤其重要，政党领袖是政党适应变革的发起者与核心，其个人因素能影响政党变革的走向<sup>[7]</sup>。

国内学者对政党适应性的研究在充分吸收国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同时，也试图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范式。张小劲<sup>[8]</sup>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出发，提出组织嬗变包括组织维持、渐进性组织变革和不确定组织变化以及组织创新四种模式，政党政治的调适对于政治体系的稳定和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杨光斌<sup>[6]120</sup>从政党的内外互动出发提出政党适应即政党对环境所具有的弹性，适应性是其制度化的重要指标，体现为“组织内部的结构性适应和功能性调整”，衡量适应性的主要标准包括政党精英观念的转变、精英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对外部的信息监测和反馈能力<sup>[9]</sup>。在胡荣荣<sup>[10]</sup>看来，政党在发展中所形成的适应外部挑战的能力，也即组织灵活性便是政党适应性，把政党吸纳精英、反对势力的能力和对社会问题的快速反应能力作为评价政党适应性的两项指标。聂平平<sup>[11]</sup>又将政党适应性划分为“外适应”和“内适应”，政党适应变革也包括结构性变化和功能性调整两方面，政党适应性是内外适应共同作用的动态过程。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外对政党适应性的考察更多地融入制度化和制度变迁之中，分析模式主要分为外源性、内源性、内外互动模式，对政党适应性变革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结构性调整和适应性调整两方面。但诸多学者都认同政党适应性是政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指标，不仅关涉政党存亡，而且对于政党政治乃至社会治理具有重大影响。综合来看，政党适应性是指政党在发展过程中面对环境挑战所形成的调整适应能力，是一种内外动态互动的结果。政党适应性不仅包括因环境不同而获致的后天属性，而且起源模式的不同、内部既有权力关系及党内精英的理念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政党适应性。总体来看，环境对政党适应的影响是根本性的，环境限定政党可能的适应范围，政党的重塑被限定于环境自身的可变范畴中。可以用两个简单的模式来说明政党的适应性过程：其一是“刺激—回应”模式，即政党被动根据环

境变化,改变和创设新的内外政治体系以使组织存续;其二是“预测—控制”模式,政党可根据自身需求,主动培育新的政治需求,控制环境演进方向重塑适合组织发展的社会环境,这一模式下政党领袖起重要作用。

## 二、环境变迁下的政党适应性

### 1. 社会现代化与政党适应性

一方面,从各国政党政治发展来看,伴随着社会现代化的进程所带来的环境要素调整,直接改变了政党身处的环境条件和社会关系,政治现代化对参与主体提出了更高的组织结构要求和职能适应能力需求。政党在“刺激—回应”回路下,必须进行必要的适应性变革以适应时代潮流和社会发展,这种“回应”特指应激性回应。另一方面,政党治理是国家政治现代化的关键,政党不仅需要被动适应,更需要主动监测环境变化,及时对社会需求做出反应。根据政党需求对社会冲突进行优先排序,通过“预测和控制”,实现对政治发展的引导。虽然政党适应性包含这两种模式,但在不同变量影响下政党实际进行适应性变革的方式和能力不同,这也解释了现实中政党适应性变革结果的差异。因此在对政党适应性模式进行分析前,有必要对影响政党适应性强弱的几个关键变量进行分析,这些变量的不同组合将影响政党适应性,继而影响政党对治理现代化的适应模式。

### 2. 政党适应性变量分析

政党起源模式、环境的性质、心理积淀(文化传统)等变量对政党适应性具有重要影响,三者间的不同组合将决定政党可调整适应的空间及对风险的调控能力。以下对三个变量做简要分析。

(1) 政党起源模式。从制度主义视角来看,政党起源模式的不同将会对政党适应性产生影响。帕诺比昂科用三种因素来说明政党起源的差异,即:政党是在区域渗透还是区域扩散基础上产生,是否有一个资助政党的外部机构存在,政党建立是否依靠个人魅力型领袖<sup>[3]85-86</sup>。帕诺比昂科原本是将这些变量用于对制度化的分析,但这些变量对于适应性的分析也同样适用。区域渗透模式下有一个自上而下的强有力中央组织,党内精英势

力较为均衡,政党适应性因而也较强;而扩散模式下地方精英会展开对政党资源的争夺,政党难以应对外界挑战。如果政党被置于一个国外机构或国际组织控制下,政党呈依附状态,其适应性也较弱。而魅力型领袖对政党适应性的影响则较为复杂,领袖若能及时洞察外界环境变动,迅速做出反应,政党在领袖执政时期便具有强适应性。但过于依赖领袖对政党长期的适应性会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适应性机制无法建立,因此亨廷顿所说的世代性(领导更换)成为衡量组织适应性的重要标准。政党建立之初所形成的党内关系模式被帕诺比昂科称作对未来的“决定性时刻”,影响深远。

(2) 环境性质。组织身处的环境无疑是组织适应性更为根本的影响变量,环境可分为国内环境与国外环境。政党所处环境一方面具有稳定性,伴随着一种政党体系的建立,政党政治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政党间的相互平衡关系能够生成维持性的动力机制,抑制新党,维持自身存在。同时伴随政党卡特化的发展,政党更多进入公共机构,借助国家资源维持自身稳定性。社会中即使确实存在新的力量和需求,但大部分都无法真正撼动现有政党的稳定性,民众更倾向于通过既有政党代表自己而很少选择另立新党。但另一方面政党不得不面对隐藏的脆弱性,政党系统的确是稳定的,真正的变革很少发生,但一旦政党缺少环境的挑战,日益僵化,这种平衡也会日渐脆弱,麻木的神经无法意识到危险的临近,政党实际上必须面对适应性动力不足和提高适应性的矛盾。国外环境则为政党带来新的窗口,迪克森认为,当执政党意识到本国与他国的差距便会进行适应性调整,“执政党领袖与国际社会融入的越多,其所领导的政党的适应性可能就越大”<sup>[6]125</sup>,反之亦然。

(3) 政治心理、文化因素。除了外界变量和固定的制度因素外,政党在长期的发展中所形成的心理积淀、制度传统,尤其是党内精英的适应性观念等心理、文化因素,对政党适应性变革也具有持久的影响力。政党在发展早期阶段所形成的心理特质会成为一种文化遗产,继而对政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例如日本自民党自成立起便具

有浓厚的保守色彩，一党长期执政的背景和传统文化的保守倾向更加重了党内的保守心理，一定程度上使得党内改革举步维艰，自民党的适应性调整长期以来都带有心理文化因素影响的烙印。这种心理因素因各政党发展轨迹的不同而差异明显，但组织中确实存在倾向提高或抑制适应性的心理因素，影响了政党的适应输出。

### 3. 现代治理中的政党适应性基本模式

(1) “刺激—回应”模式。政党的适应性在现代治理条件下首先表现为“刺激—回应”模式，在外界环境变量的输入下，组织根据自身变量采取对环境的不同适应性模式。政党只有在外界刺激达到一定水平时，组织才可能开始采取行动回应问题。这种对环境的适应模式涉及组织的多个方面，既有外在结构形态的调整，也有内在职能、意识形态的变动。

以下仅就显性的策略、战略、组织结构调整进行分析。

①策略适应。政党对外界刺激的回应首先是通过一系列具体策略调适累积完成的。政党对环境变化的敏感度远较政策问题敏感度低，因而政党的回应通常是从某个具体问题开始的，最先采用的手段也是政策调整，这种调整往往是暂时性、孤立存在的。政党会根据社会变化和选民要求而采用新的政策代替以往僵化的做法，策略适应是政党最普遍采用的模式。现代治理对政党策略适应方面的要求在于更多采用柔性策略，通过协商与沟通合作的方式实现治理。②战略适应。当外界环境变化达到一定阈值，策略适应累积到一定程度，政党会进行重新定位，改造原先旧有价值理念以适应社会的发展。正如基希海默尔提出的政党由群众性向全方位发展的趋势一样，政党在某些关键时刻，例如社会变迁导致政党社会基础变动时，必须调整组织战略适应环境以确保组织的生存。这种适应性包括总体规划、战略目标、意识形态、行动纲领的调整，20世纪90年代后西欧社会党的转型、当代绿党纲领的转变、政党理念从统治过渡为治理都是这一适应模式的体现。③组织结构适应。政党是以组织的形态存在的，其组织结构是其职能运转、实现特定目标的基础。结构影响组织职能的发挥，同时政党的结构性适

应又受到已有组织结构、竞选压力、特定环境、政党现拥有资源多寡的影响。当党内精英意识到必须提高适应性以应对环境挑战时，便会着手变革组织的职能结构，以使组织能够担负起变革的使命。政党的组织结构适应更多是对“结构性危机与目标调整的内部回应”<sup>[6]121</sup>，既包括外在的组织形态变革，也包括内在的权力结构调整。组织结构的调整重塑了党内权力关系，改变了精英间的互动模式，这种内在的关系模式将影响政党适应性的强弱。在现代治理中，政党结构朝着提高组织规范化、制度化水平，扁平网络化交流结构，增加透明度和信息公开，职能分工具体化精细化等方向演进，通过结构适应强化政党社会整合能力和治理水平，将政党运行纳入国家治理框架中。

(2) “预测—控制”模式。政党在被动适应环境变化的同时，亦会采用“预测—控制”模式试图干预环境，影响环境参数，以利于自身的发展。当然环境对于政党适应性的影响更为根本，政党主动控制只能在一定空间内作用调适。政党主动监测外界环境变化，预测社会发展的可能趋势并及时进行反馈的能力是适应性的重要部分。政党适应性并非单向作用的结果，它体现为政党与环境的双向互动、被动适应和主动控制交互进行的过程。

“预测—控制”模式主要涉及政党对信息的监测与反馈、“塑造”社会分野、进行独立变革等方面。①对信息的监测与反馈。信息是行动的诱因，政党与环境进行信息互动的频率反映政党与外部的联结程度，对外部有高依存度的组织对适应性愈重视，其对信息更具敏感度。迪克森认为政党适应性部分取决于“政党监控环境的反馈机制的有效性”，政党若想适应社会变迁的挑战，“必须具备监控环境如何变化的能力”<sup>[6]124</sup>。政党对信息的监测与反馈能力是实现成功适应的基础和前提，强适应性政党往往都有一整套完整的信息反馈机制。现代政治生活范围日益宽广，海量信息瞬息万变，要求参与主体不仅有监控环境变化的能力，而且必须具备识别有效信息和对问题快速反应的能力。政党如果能通过对信息的监控和反馈，预测环境变化的可能方向，主动进行适应性变革，将使组织存续可能性大大增加。②“塑造”社会

分野。李普塞特和罗坎提出政党的产生源于社会分裂产生的不同分野线,政党反映不同的社会分野,这些分野的冲突将产生不同的社会合作模式。随后沙特施奈德转变了这一理论的视角,在沙特施奈德看来,政党不是单纯反映分野,政党尤其是政党领袖可以重新“塑造”分野。政党实然无法制造社会冲突,但在一个有众多分野的社会,这些多样化“利益和身份的冲突在政党制度内得以反映和显示时并没有自然顺序,而是政党领袖……人为地对冲突的重要性进行排序”<sup>[3]218</sup>,政党领袖重新界定了最重要的社会分野。政党不仅是在被动反映社会分野,而且能塑造环境朝利于政党的方向发展。现代社会发展中,多样化的冲突不是被同时平等地表达,政党具有限制选民政治视野和决定政治话题优先性的能力。这种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环境的影响,政党领袖“培育”了他所面对的社会分野模式,政党适应性取决于这种重塑能力。③独立变革的能力。政党独立进行变革的能力是指,政党在对环境的监测和预测后,主动开展适应性变革的能力。它与“刺激—回应”模式下的变革不同,这是一种政党利用现有资源主动进行的变革,同时这种变革不仅在组织内部进行,政党还会试图变革周围的环境因素,尤其是其中的制度成分。伴随政党的卡特尔化,政党开始更多借助公共资源以维持自身存在,前文也提到政党三个角色之一中的作为公共机构中的政党,政党对外界环境的变革正是通过这一角色实现的。政党间既有党际关系很大程度决定了政党政治的权力框架,政党以议会、行政机构的角色变革环境中的制度因素,以保障政党的稳定,现有制度可以说是对既有政党关系的固化和维持。政党对于外界环境的变革能力,尤其是在制度规范、公共政策制定方面具有不小的影响力。

### 三、政党适应性的发展与展望

从世界范围政党的发展历史来看,政党的弱适应性不仅影响组织生存,且易引发政党体系变迁,增加政党政治的风险,带来不稳定性,诱发政治变迁。而强适应性增加了政党在易变环境中的生存可能,继而对社会、政治产生持续影响,引导社会变迁,塑造社会的某个方面。政党适应

性是一种环境主导下,组织内部因素不同组合影响的动态过程中政党获得或变化的能力,是“刺激—回应”与“预测—控制”复合作用的结果。从目前来看,政党不仅需要具备快速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政党本身也要具有能动成分。虽然环境输入是根本性的因素,但政党在自身不同变量作用下,可变现出不同的适应输出,对环境变迁有加快或延缓的功效。应该注意的是,政党对环境的适应不等于随波逐流,丧失自主,政党无法同时适应社会多方易变的利益需求,适应必须有的放矢,政党需要具备自我完善和自主变革的能力。但政党的发展离不开环境,政党的适应是互动中的适应,政党本身便是环境的一部分,政党的改变也意味着与政党关联的外部环境因素发生变动,从而部分改变了环境。在如今复杂多变的现代社会中,社会变迁带来的冲击是政党共同面对的挑战,而社会治理体系的日益现代化又对政党适应性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代治理要求政党适应更具有前瞻性、预测性,对信息有一套反馈处理机制,能对信息及时处理,结构更加灵活,内部更加规范透明,同时也要能有限度地重塑所处的政治生态环境。政党发展面临着更高的挑战和期望,政党必须整合自身力量,调整结构,聚合资源,主动适应环境变化,以自身发展引导变迁。

### 参 考 文 献

- [1] 塞缪尔·P·亨廷顿. 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M]. 张岱云,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 [2] BRUCE J D. 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and Taiwan; the Adaptability of Leninist Parties [M].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97.
- [3] 艾伦·韦尔. 政党与政党制度[M]. 谢峰,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 [4] ANGELO PANEBIANCO. Political parties: organization and power[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
- [5] PETER MAIR. Adaptation and Control: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Party and Party System Change, in Western European Party System – Continuity & Change [M].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1983.
- [6] 杨光斌. 制度的形式与国家的兴衰[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7] HAMEL ROBERT, KENNETH JANDA. An integrated theory of party goals and party change[J].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1994(6): 264 – 269.
- [8] 张小劲. 关于政党组织嬗变问题的研究: 综述与评价[J]. *欧洲研究*, 2002(4): 62 – 77.
- [9] 杨光斌. 制度变迁中的政党中心主义[J]. *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29(2): 1 – 6.
- [10] 胡荣荣. 自主性与适应性: 政党视角下的政治变迁——以二战后的新加坡和台湾地区为例[J]. *国外理论动态*, 2011(11): 78 – 84.
- [11] 聂平平, 武建强. 西方政党适应性问题理论述评[J]. *新视野*, 2010(4): 77 – 80.

## Stabilization and Evolution

——A study on the adaptability of political parties under the environmental changes

CHEN Wei, ZHOU Peng-fei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 The adaptability of political parties, the adaptive capacity to the environment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is a feature acquired in the interaction with the environment in two manners. One is the “stimulus-response” mode in which political parties are evolved passively to establish the new political system for its existence. The other is the “prediction-control” mode. The political parties actively bring up new political topics according to their own needs and steer the environmental evolution to meet the need of their own development. The adaptability of political parties is a dynamic state for it varies in different stages and differs because of their diverse origin, environment and culture. According to the new demands of the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for the political party adaptability, political parties should take the initiative to face the challenge and play a role of an important guarantee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governance ability.

**Key words:** the party; adaptability; modern governance; steer

【编辑 王思齐】